

人文经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因应

鲁明川

(浙大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5)

摘要: 当前, 理论界在何谓人文经济、人文经济何为等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上, 还存在相当程度的敞开性和发展性。无论是从理论维度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 关于人文经济的研究, 首先需要回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场域并与其建立本质联系。在此路向中, 人文经济应该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一种新发展范式和治国理政方法, 而不是某个单纯的学科或学派, 它呈现出以“人”驭“物”、“经济—文化”的交融互动、推进文明进步三个方面的实践特征, 并在总体性、辩证性和超越性上因应中国式现代化, 进而真正获取自身的现实规定性。

关键词: 人文经济; 中国式现代化; 总体性; 辩证性; 超越性

中图分类号: F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511(2025)06-0013-08

DOI:10.19808/j.cnki.41-1408/F.2025.0056

2025年10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 全面擘画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宏伟蓝图。作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成果, 《建议》指出, 要“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1]。近年来, 围绕人文经济及人文经济学的研究热度呈现高涨态势, 尤其是关于人文经济及人文经济学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和现实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已形成较为丰硕的成果, 但是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上仍聚讼纷纭, 不少学者仍引用人本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西方理论范式对其进行阐释, 这些理解路向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论风险和缺憾。本研究认为, 人文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 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存在密切关联, 厘清二者的关系是开展人文经济及人文经济学研究的前提。

一、以“人”驭“物”：人文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性的因应

总体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特质和实践要求。“只有从总体性视角理解本质要求, 才能理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何以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并确立和持守自身的本质规定性”^[2]。人文经济主张的“文化—经济”融合论, 蕴含着一种以“人”驭“物”的实践旨向, 积极因应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

(一) 总体性缺失：西方现代化的内在缺憾

资产阶级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创造了蔚为大观的物质文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给予了肯定: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3]但是, 西方现代化在创造“物质丰裕”的同时, 也造成了人的精神世界的相对贫瘠。随着货币这一最具抽象性的价值形式的普及, 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逐渐被置换为对交换价值的追求, 物质丰裕与精神贫瘠的矛盾日益加剧。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资本创造文化”^{[4]257}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生成与运行逻辑, 即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和增殖的要求创造了相应的文化系统, 其具体表现为“崇尚物质至上的世俗文化、追求同质齐一的机械文化、强调个人利己的功利文化和吹捧形式正义的伪善文化等基本类型”^[5]。

收稿日期: 2025-03-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AKS006)

作者简介: 鲁明川(1981—), 男, 安徽定远人, 博士, 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历时地看，人类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又很快陷入对物的全面依赖，物获得支配人的强大力量，“人的价值被物质化和量化，一切都成了可让渡的商品……精神在货币面前可与物质同价类比；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尺度本身也被还原为物，并可以被让渡”^[6]。在西方现代化物质生产“高歌猛进”的同时，人的主体性却日益被资本褫夺，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和总体性也逐渐消散。

随着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西方社会日益分离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贫富分化日益加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决定了西方现代社会不仅不可能真正地解决贫富分化问题，而且还必然刻意地维持绝大多数人的贫困状态以保证剩余价值的持续创造。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考察了十八世纪以来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的动态变化情况，用翔实的数据证明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带来物质富庶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贫富分化不断加深的事实，“全球最富的0.1%人群（人均财富为1000万欧元的450万名富豪）拥有了20%的全球财富”^[7]，皮凯蒂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极端野蛮的一面，即一方面是极少数资本家与社会精英阶层对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持续占有和掌控，另一方面是绝大多数人挣扎在被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幻象所遮蔽着的社会贫困之中。

西方现代化持有的发展观是一种“经济增长观”，而非“经济发展观”，它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那里，自然为人所用、经济无止境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铁律，不增长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死亡。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增长观，它给作为人类生存发展之定在的自然界带来了巨大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对立，分析了资本逻辑推动的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及其严重后果，确证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本性肇因。1972年，罗马俱乐部亦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分析了西方现代化的生态悖论，指出在生态约束和自然资源稀缺的现实条件下，所谓GDP增长不仅不可能是线性的，而且极有可能触发不可控制的危机。著名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描述了经济增长的核心部门——化工行业如何对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人们对“唯GDP”的“经济增长观”的反思逐渐兴起。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分析的那样，倘若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制度体系，要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是不可能的。当下时兴的绿色资本主义思潮，仍徘徊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之中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对自身发展的修饰——为其本质需求披了件绿色外衣”^[8]，它不仅于现实生态危机无补，更在特定条件下成了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维系全球霸权的新意识形态工具。

（二）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性的集中体现

“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无疑都是一个极具总体性内涵和意蕴的范畴”^[9]，其总体性集中体现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中，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立场上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根本所在。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发展目的。这是对群众史观的原则遵循和价值践成，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总体性超越。它一方面实现了从资本向民本的复归，另一方面将人从“抽象人”还原为现实的、鲜活的和有着全面发展需求的人，它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导向，通过导控和驾驭资本，拓展现代化的发展维度，确立现代化成果的公平分配原则。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动态呼应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内涵和结构上具有全面协调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一并实现了发展布局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以及涵盖了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五位一体”的高质量跃迁。应当说，“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基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现实需要提出来的，它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内涵，这种总体内涵是一种互生共成的有机性结构。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在总体上表现为一个不断发展且极具生命力的有机体。再次，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行动自觉因循和发展社会主义本质。一是在富裕主体方面，强调财富主体的全体性和人民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绝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少数人的富裕，

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二是在富裕内涵方面，强调财富内涵的丰富性、全面性和人本性。其强调物质与精神都富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富裕。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铸而成的现代化范式，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引领生产方式创新，开辟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路。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以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创造可持续发展条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以资本盘剥与宰制自然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解放和发展绿色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创造性实践，破解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固有难题。

（三）以人文经济推动总体性现代化

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快速变迁中，中国也曾面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够协调的现实问题。如何创造性地处理好“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真正将“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亟需回答的时代课题。人文经济学不是“人文”经济学，而是“人文经济”学，它是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引领的“文化—经济”融合实践创新，它以人文经济新的发展范式积极因应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

人文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处理“人”和“物”、“经济”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创新性范式，其内在逻辑在于以“人”驭“物”。作为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主要阐发者，习近平总书记早在浙江工作时期就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10]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将“物”的逻辑统摄于“人”的逻辑之中，为人民群众开拓出全面发展新空间，“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调适和深化，人文经济由此作为一种恰逢其时的发展范式不断丰富完善。

人文经济的主要特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西方经济学也讨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但它主要关注的是文化产品的供求和效益，忽略了文化与经济之间围绕“人”发生着的交融互动。同时，人文经济与西方人本主义经济也有本质区别。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人文经济既不是经济决定论，也不是文化决定论，更不是经济与文化的断裂论，而是站在人类现代化实践的潮头来反思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进而将经济和文化的交融互动视为推动人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近年来，在文化和经济的结构互嵌中，中国坚持以文兴业、以文赋能，大力推动文化要素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塑造出独特的人文经济新业态，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总体性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实践。

二、“经济—文化”的交融互动：人文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辩证性的因应

辩证性是总体性的重要体现。人文经济以“文化”和“经济”的辩证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互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发展，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辩证机理，是中国式现代化辩证性的重要表征。

（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互动

人文经济作为“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新范式，是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辩证互动关系的现实注解和生动体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1]中

国式现代化具有典型的辩证性，这种辩证性首先表现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互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既是“经济”与“文化”不断融合互促的过程，又是人文经济发展范式不断形成的过程。在“中国式的现代化”提出初期，我们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视为“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12]的重大现实课题。这一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推进，若不妥善处理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问题，建设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将彻底失去其合法性和生命力。在进一步发展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性问题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期，深刻认识到文化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文化优势论”“文化生产力论”，并就二者的辩证互动关系做了深入阐释：

“物质文明的发展会对精神文明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精神文明的发展又会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动力，尤其是经济的多元化会带来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只有把精神文明建设好，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人”的立场上讨论“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其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方法，从人文经济的视角，为回答“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得更好”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13]。

物质与精神作为人类社会形态的基础性内容，二者在特定社会有机体中的关系具体体现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这是唯物史观所揭示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人类现代化实践行进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今天，精神之于物质的反作用愈发强劲。“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尽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在这一决定性关系之中，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在特定时期也有可能更突出，这一反作用体现在促使特定时期的社会主体以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进行开创性的探索与实践上^[14]。当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在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人民群众干事创业、守正创新、踔厉奋发的精神力量不断展现，全社会形成了一股勇毅前行、昂首阔步的崭新气象和精神氛围。这种丰沛和充盈的精神力量有力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尤其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及其所生发的文化自信，他将其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支点和强大精神力量。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苏州、杭州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典范，同时也是作为发展新范式的人文经济的城市实践“样本”^[15]。因此，人文经济或人文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学科或学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对现代化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互动、协调共进的实践把握，是中国式现代化辩证性的集中体现。

（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毫无疑问，人文经济同样关注经济活动的效用、效率和效益问题，它“围绕人文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展开，重点是围绕微观生产与消费行为的人文效率与人文效用，围绕宏观经济环境的人文公共品”^[16]。这是把握当代现代化实践中西方主流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的有益途径。西方经济学的自然科学转向，导致其对自身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贬低甚至拒斥。作为所谓的“理论严密的实证科学”^[17]，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物对于人的效用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将人的需求框定在物品层次，并将其作为一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加以量化处理，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研究范式。这导致其无法理解和把握文化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机制和运行规律，而只能在浅层次上将人的文化实践及其产生的经济现象理解为一种文化经济学或文化产业学，这显然是对精神文化资源的狭隘理解。人文经济则将精神文化资源高置，在考量物质资源效用的同时，重视精神文化资源的效率、效用问题。在效率上，人文经济注意到经济活动中人文

要素对效率的深层次提升作用。“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赋能……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的拓展，人类改造自然、取得财富的能力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增加”^[10]。在效用上，人文经济重视精神文化消费品尤其是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的人文效用。人文效用可有效缓解以至打破物质产品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对消费者而言，越是高质量的精品文化产品，往往越具有更为持久的吸引力。

人文经济视域中的效益问题，不仅仅关涉具体行业领域中的经济效益，它更强调宏观层面的社会效益。一般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定来考量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问题的，因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那里，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自然结果。如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利益的自由实现会自然而然地使整个社会获益。而西方现代化实践表明，这种理想机制所对应的现实情况却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对立。从经济效益来看，西方所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就背后实存在着极端化的贫富差距，在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上，表现出严重的社会不公；从社会效益来看，财富的私有化取代了财富的公共性，财富对于社会发展的正向性作用被严重削弱。在政治生活中，资本与权力的勾连共谋愈发严重。在文化生活中，资本主义庸俗文化侵蚀着社会精神生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对物欲的极致追求导致对自然无止境的索取和盘剥。社会作为人类的聚合形式，在西方经济学的理性设计中，逐渐丧失其有机性和精神性。

人文经济以“现实的人”的唯物史观立场来化解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对立问题。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事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现实的人，这种现实的人创造出具有特定形式的社会形态。人不是西方经济学所定义的“理性经济人”，在现实层面，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体。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已有不少流派认识到人在经济决策时并非是完全理性的，道德、文化、心理等非理性因素在经济活动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文经济对人文要素的经济价值进行充分挖掘，从更为宏阔的视角对突破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二元对立进行了有益探索。它不仅将人正确地看作“现实的社会人”，还在此基础上将人看做“文化人”，强调先进文化对经济活动的价值纠偏和价值导引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10]不难发现，以人的发展为中轴的人文经济旨在统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构成中国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主线”^[18]。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发展

人文经济作为新发展范式，致力于突破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思维成见，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一是在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反思中推进二者融合发展。人文经济强调的文化首先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原因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19]。二是在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力量中实现融合发展^[20-2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起，熔铸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和最为磅礴的精神力量。三是在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治理价值中融合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方面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些智慧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譬如在经济领域，“义利并重”“以义为先”“守信”“均富”等理念，提示着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要注重社会责任。在生态领域，“天人合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等理念，为绿色发展、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念指引。在社会领域，“家国情怀”“厚德载物”等理念，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黏力。四是在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经济价值中融合发展。人文经济

的重要内容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产业，通过市场化、品牌化，让传统工艺、非遗技艺等文化产业在现代产业中焕发生机、蓬勃发展。五是在增强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中融合发展。人文经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构建文化认同，增强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有助于进一步推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中华文明叙事体系构建，塑造可爱、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三、推进文明进步：人文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的因应

总体性和辩证性中内蕴着超越性。人文经济不仅以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践基点，还为破解西方现代化的“人文困境”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由此因应和确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和历史进步性。

（一）从资本到民本：人文经济对现代经济活动价值立场的矫正

人文经济的核心与中轴在“人”，它强调人文逻辑与经济逻辑的良性嵌合，超越了西方经济学视域下经济活动中纯粹的物化逻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场域中，人文经济不仅具有前述方法论层面的创新，还显示出以民本超越资本的价值旨趣。一方面，人文经济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将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作为新时代经济治理的重要思想文化来源，高度重视传统民本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价值规导作用。另一方面，人文经济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并推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石，揭示了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经济活动及其经济学的终极价值目标，是典型的“以人为本”的发展学。人文经济将人文精神作为其内在的规定性本质，充分彰显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立场。当下，深入研究人文经济可以为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从而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助力^[22]。

（二）从物欲化生存到美好生活：人文经济对现代生活的重塑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美好生活”作为人文经济的目标导向，具有高远的超越性向度^[23]。首先，美好生活不仅关乎物质富足，还更强调精神满足与价值实现。人文经济将精神层面的需求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突破了传统经济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局限，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物质主义框架，反映了人们从物欲化生存转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次，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高阶空间，符合人类精神生产规律的文化可以释放经济活力。人文经济对文化的激活与创造，既保证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质量，又有利于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引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重点转向全面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提供现实保证。最后，美好生活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终极目标，它所指向的是一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横向展开和纵深推进中不断实现的生活化变革。人文经济将“人”视为“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将“人”理解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因此它拒绝对美好生活进行抽象地规定和虚妄地臆想，而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发展进程，着眼于全体人民现实需要的客观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中，切实地关照民生福祉，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创造人人享有的美好生活。

（三）从量的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人文经济对现代发展观的系统更新

人文经济契合着新发展理念，辩证地把握着发展的质与量的关系，深刻揭示了发展的根源性动力，有助于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人文经济主张“文化—经济”的深层交互，实际上是把文化作为一种复合性创新要素融入生产，推动生产工具的创新和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另外，人文经济“以不断追求扩张的‘经济空间’作为驱动力，以不断发展的人们精神世界的交往所形成的‘文化空间’为索引力，以这两极之间的科技应用为中介，形成了‘经济—科技—文化’的整体”^[24]，其为“文化”牵引“经济”提供了“科学技术”中介，推动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一是优化产业结构。

如何组织和运行经济活动关乎发展的持续性。人文经济打破了西方产业经济学对文化产业的狭隘认知，塑造出独特的人文经济形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结构性动力。二是激发人的历史主动性。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是人，而且是具有历史主动性和创新意识的人。人文经济从“人”的视角考量发展问题，主张把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统一起来，进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起高质量发展所需的人民力量。三是创新体制机制。体制机制创新是发展的深层动力。人文经济在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提供了改革的着力点。借助文化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打破体制机制改革的阻碍，缓解体制机制调整的震荡，润滑体制机制运行的滞涩，提升体制机制治理的效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从理性至上到人文复归：人文经济为人类现代化探索作出中国新贡献

人文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推动了经济学的“人文回归”。在西方理性主义的牵引下，西方经济学逐渐抛却了本应倡导和发展的人文精神。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罗纳德·哈里·科斯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经济学科从人类创造财富的道德科学变为资源配置中的冷酷逻辑，人性的深度和丰富度是最显著的代价。现代经济学不再是研究人类的学科，已经失去了根基，偏离了经济现状。”^[25]人文经济的出场，以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丰裕，更是“人文精神”的现代化。这无疑会给西方引以为傲的西方经济学带来极大震撼，推动其反思自身的理性传统和人文缺失。

人文经济为世界发展增添“人文韧性”。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人文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在以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凝结而成的现代化智慧。这一现代化智慧既源自古老的中华文明，又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世界历史性，是应对和化解当下世界发展所面临的经济赤字、生态赤字和人文赤字的宝贵知识资源。从实践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所推动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型，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压舱石”和“动力引擎”。人文经济凭借对人文价值的重视和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不仅寻找到了经济和文化融合发展的“钥匙”，还为解决世界发展赤字、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促进全球携手前行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应当说，人文经济发展范式的确立，为传统的世界经济交往扩展了文化空间，增添了人文韧性，其彰显了中国“以义为先，义利并举”“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人文交往精神，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世界经济交往良性发展增添了信心。

人文经济为推进文明进步提供人文智慧。人文经济的“方法论基础与价值取向是文明论而不是学科论”^[26]。因而我们应该站在方法论、价值论甚至是文明论的高度，来理解人文经济在人类现代化方法变革、价值重塑和形态跃迁等方面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在现代化方法论方面，人文经济学提供了一种以人为中轴的文化与经济辩证互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发展范式；在现代化价值论方面，人文经济提供了一种超越现代化“物化”困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在现代化进步方向方面，人文经济可谓是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更为具象化的“人文经济”形态。总之，人文经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或者文化学，而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回归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总体性方法，它为人类现代化和文明进步提供了新范式。

结语

任何理论上的多向切入和深入掘进都是为了获致研究对象的现实性。就人文经济研究而言，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自觉，是其突破传统话语束缚、确立自身现实规定性的关键所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人文经

济具有本质关联,随着人文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中不断生成和展开,我们的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表征、实践因应来拓展,这也是我们正确理解以及推进人文经济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实践要求。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27-28.
- [2] 鲁明川,易美宇.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总体性阐释[J].浙江学刊,2023(4):70-7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57.
- [5] 付文军.“资本创造文化”论题的学理阐释[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0-19.
- [6] 张雄.货币幻象: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4(4):53-60.
- [7]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52.
- [8] 蒂姆·杰克逊.后增长[M].张美霞,陆远,李煦平,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2:IV.
- [9] 沈江平.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阐释[J].中州学刊,2024(4):5-13.
- [10]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291-295.
- [1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23.
-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
- [13]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95.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
- [15] 杜尚泽,潘俊强.总书记关注的这个题目,有中国的未来[N].人民日报,2023-07-10(1).
- [16] 胡钰.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4):38-46.
- [17]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M].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65.
- [18] 郭志伟.中国人文经济学:内涵、出场逻辑、研究主线与构建路径: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J].管理科学,2024(6):33-41.
- [19]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 [20] 朱俊,唐倩玉.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民族发展的价值与影响[J].殷都学刊,2025(3):106-109.
- [21] 刘灵光,许海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维度[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21-29.
- [2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7.
- [23] 毛勒堂,韩涛.作为总体性的“美好生活”及其可能[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3-19.
- [24] 鲁品越.从经济空间到文化空间的生产[J].哲学动态,2013(1):24-27.
- [25] 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糟糕的经济学[M].朱源,徐坤,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11:6.
- [26] 樊浩.人文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学”?[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5-14.

Humanistic Economy: Practical Responses to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U Mingchuan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City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academic inquiry into fundamental questions such as the definition and purpose of the humanistic economy remains considerably open and developmental.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andpoints, research on the humanistic economy must be grounded in the practical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establish an essential connection with it.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e humanistic economy manifests not as a discrete academic discipline or school of thought, but rather as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a method of governance intrinsic to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 exhibits three key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human agency guiding material processes,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and catalyzing civilizational progress. By aligning with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its holistic, dialectical, and transcendent dimensions, the humanistic economy thereby acquires its own reality prescription.

Key words: humanistic econom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olistic; dialectical; transcendence

【责任编辑 郭志伟】